

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

傅 斯 年

(一)

譬如說，「管子書是假的」，這句話和說「管子書是真的」同樣的有毛病。假如在後來歷史觀念作者觀念大明之時，出了一部管子書；裏面並不顯然出來些管子的諡，桓公的諡，管子死後事，而題曰，「春秋時齊相潁川人管仲撰，」以問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來是一部做了售世的書，這然後說，「這部書是假的」。若管子書中，引老子，引戰國末年事，稱桓公的諡法，稱管仲的死後事，本是齊人託管子之功名而著之書，只是當時的一種文體，他自己先不曾說是真的，戰國時也不會有題「齊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勞我們答他曰「是假的」。既有一個梁任公先生，硬說管子那個人做了管子那些書，便應該有人回答他說，管子不曾做了這些篇的一個字。說到這樣好到這樣。若進一步去說，管子書是假的，則先須假定戰國時人已有精嚴的著者觀念，先須假定戰國時這些篇出來的時候上邊寫着「齊桓公相管仲撰」。這樣假定當然是不可以的。管子這部書現在所見的集合，乃是劉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齊學之會集，書中直接稱道管仲的篇章，在戰國託於人而出來，也不過是自尸爲管仲之學之後世，別人敘論他，也不過可說「慎輕重，貴權衡，因禍爲福，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齊人聞管仲之傳說而悅之，作爲……。」果然我們充管仲晏子是假書一類話，則國語論語孟子墨子莊子等等無不是假書，因爲國語當然不是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寫的，論語當然沒有一個字是孔子寫的，孟子書稱梁惠王襄王之諡當然也是他的弟子記的。墨子中最墨子者，也譬頭就說「子墨子言曰」，中間又說「是以子墨子言曰」，莊子更是漢朝人所集合，魏晉人所編印的。那麼，真書只剩了呂覽，還要減去月令了。若說這些書裏有些真話，真材料，則我們又焉能保管晏書中沒有一點真話，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別罷了。我們這樣 *ad absurdum* 一看，可以確知我們切不可以後來人著書之觀念論戰國文籍。總而言之：

(1) 戰國時「著作者」之觀念不明瞭。

(2) 戰國時記言書多不是說者自寫，所託只是有遠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罷了。

(3) 戰國書除呂覽外，都只是些篇，沒有成部的書，戰國書之成部，是漢朝人集合的。

這層意思，我們反覆說來好像不厭其詳者，實因為了解戰國文籍之成書性，是分析戰國文籍的一個前提。

(二) 記言——箸論——成書

箸述脫離了官書的地步，而成私人箸作，我們現在可見之最早者，是論語。論語是記言的。論語的體裁現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幾段記得較豐充以外，每一段話，只記幾句，前無因，後無果。在我們現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猶可說，乃漢儒對於論語上的話，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為而發的樣子。且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着「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展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都像論語所記那樣子，恐怕他所專要見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這樣看來，論語成書時代，文書之物質尚難得，一段話只能寫下個綱目，以備忘記，而詳細處則憑口說，到了戰國中年，文書的工具大便宜了，於是乎記長篇大論如孟子莊子書那樣子的可能了遂由簡約的記言進而為鋪排的記言，更可成就設寓的記言。記言是戰國文體的步初。論語，孟子，莊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書中的演說體，以及兼記事記言的國語，都屬於這一類。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機會言之而出，而假設的記言有時不信人，有時又大費事，於是乎舍去記言之體而據題抒論。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現在看荀卿的書，好些不是記言，而是據題為論者，這樣箸篇，實是記言之一變，由對語(Diglogue)進而為單語(Monologue)這樣體裁，恐怕戰國中期才

有 現存戰國末年書，如商君書，荀子，韓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體上屬於這一類。這是戰國諸子文體演進之第二步。

箸論雖已不是記言，但獨立的論，仍然只有篇的觀念，沒有書的觀念。戰國晚年五德六數之義盛行，人們箸書常趨於系統化。慎到箸十二論，（見史記）這個數目是很整齊的，而又以齊物爲首，（見莊子天下篇）或者這是做全部書的開始。但我們現在不見慎子全書，不能作決定。而呂不韋之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乃成一部至始要終的書，不是些散篇了。八覽六論十二紀，六爲秦之聖數，八則卦數，十二則記天之數，這三個數八，六，十二，也都是在當時有意義的整數。這部呂子真是中國第一部整書，以前只是些散篇而已。這個體裁雖始於戰國末，然這樣的系統著作尚非依傍大財力不可，故漢朝人之繼續者，始有劉安，在體裁上淮南子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的呂氏春秋。太史公未必富，但有異常的精力，也許武帝時文書的物質更廉了，於是百三十篇又是一部要去貫天地人的通書。十表像天干，十二本紀像地支，書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轂之語，七十列傳之數亦取一個豐長的整數。從此以後，系統的箸書乃更多，周禮之成書，一往整齊，卜筮如太玄，續子長者如漢書，乃至字書之說文解字，都在那裏有始有終，託於系統哲學啦。

更把上文寫成一表如下

記 言 之 書——→成 之 篇 書——→系 統 之 書		
(一) 因受文書材料之限制但記一言之綱目者如論語	由託言一變即成箸論	由箸論之相爲終始即成一系之書
(二) 豐長的記言如孟子		
(三) 託言如莊子		
(四) 故事之製作如韓子說林		

蘇格拉底有語無文，猶之孔子時。柏拉圖依師說散爲無窮盡之對語，對語亦記言。亞里士多德乃真箸書。在中國一二百年中之變遷，在希臘則師生三代各代表之，這頗是一個文體進化的平行現象。

問曰 因文體之演進，文詞之內容會不會受影響的？答曰：這是不免的。文辭之

由記言而箸論，由箸論而成書，是由自然的話語到了較不自然的斲飾辭句。說話固可以抽象，然總不能忘了聽的人之直接了解，說話固可以鋪排，然總不能忘了聽的人之捉模得住，一經離了純粹記言的地位，文法可以代語法，泛詞可以代切詞。戰國子書中頗有不少白話，而荀子已是很簡約的文言，呂氏春秋已有些無話說話的油腔滑調，入漢而箸作者，更都是文言了。（此處用文言乃如所謂 *Kunstsprache* 與古文不同）

十八年二月